

中国土司史上的一个典范

——汶川瓦寺土司

◎ 任新建

【摘要】 汶川县瓦寺土司，始封于明英宗正统时，兴盛于清代，民国时衰落，解放后彻底废除，前后延续500余年。瓦寺土司在历史上很著名，不仅因为它“世有大勋”被中央王朝封为阿坝地区地位最高的土司，更因为它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堪称中国土司制度的一个成功典型。

【关键词】 土司制度；汶川；瓦寺土司；典范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5-0081-6

汶川县瓦寺土司，始封于明英宗正统时，兴盛于清代，民国时衰落，解放后彻底废除，前后延续500余年。瓦寺土司在历史上很著名，不仅因为它“世有大勋”^①被中央王朝封为阿坝地区地位最高的土司，更因为它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堪称中国土司制度的一个成功典型。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即中央王朝任命当地民族部落首领为朝廷职官，通过他们对当地民族进行统治。

土司制度是基于“以夷制夷”政治思想和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在边疆与交通不便地方，面积辽阔，人口居处分散，在“夷夏有别”，民族隔阂较深的封建时代，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难以直接施治，只能通过招抚笼络当地部落首领，来达到间接的统治，于是有“羁縻”之制产生。

早在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就已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称为“道”的特别行政机构实行羁縻^②。例如秦在都江堰、汶川一带设置“湍氐道”，汉在汶川设置“绵虬道”等。这些道的官吏即以当地民族首领担任，使之隶于郡县。到了唐、宋时

① 乾隆二年诏谕称：“查瓦寺世有大勋，皆能恪恭厥职。”

② 《史记正义》“县有蛮夷曰道”。《后汉书》李贤注“县管蛮夷曰道”。

〔作者简介〕 任新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与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期,朝廷对于难以实行直接行政管理的民族地区,大量设置羁縻州县,如唐朝于松州都督府置“松、当、悉、静、柘、恭、保、真、霸、乾、维、翼等行州,以部落首领世为刺史”^①。宋朝在今甘孜州、阿坝州、州凉山州和雅安地区一带民族地区设置了一百多个羁縻州^②。不过,这些羁縻州,大都建置不全,“兴废无定”,“叛服无常”,难以有效管理,基本上仅达到“怀柔”之目的。直到元朝建立了土司制度,才使“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土司制度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形成与衰亡,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历史上,比起汉唐的羁縻道、州、县制来,土司制度更适应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有利于跨越民族隔阂,缓解民族矛盾,实现国家对少数民族地方进行有效地统治,保障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因而自元以来的六百多年中,土司制度在安定边疆,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土司制也有着很大缺陷,从社会发展方面看,由于中央王朝本着“因俗而治”的原则,对土司所属内部事务一般不予干预。因而土司在其管领的地区长期保留传统的社会制度与生产关系,制约着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以致土司地区直到民主改革前大多仍处于封建农奴制或奴隶制之下,人民过着苦难的生活;从政治管理方面看,土司制虽维系了中央政权对民族地区的统治,基本上保持了这些地方的稳定。但由于土司的自治权力过大,政府对其的实际控制较弱,一些边远之区的土司,往往易“坐大”,挑战朝廷的权威。尤其在中央王朝衰弱之时,更易出现不服朝令,为所欲为的情况。因而当土司制危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时,中央王朝亦曾通过“改土为屯”和“改土归流”的方法来变革土司制度,但因产生土司制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铲除,这些措施都并未完全达到目的。直到解放后进行民主改革,才彻底废除土司制度,使民族地区进

入社会主义。

土司制度与“流官”制度截然不同。流官是由朝廷从全国中拣选委派,任职一方,任期不过三、五年,任满另调他地。而土司则是世袭的,守土一方,只要“恭顺”,就可以代代相承,世官其职,世领其地,世管其民。即使朝代的更替,一般也都不会影响其职位,甚至可能被新朝加封晋升。明代的许多土司都因“明袭元制”而继续留任,清代的土司也大多是明代旧有的,只不过由清廷重新颁给号纸印,予以册封。例如元代的长河西安抚司,明朝开国后即来投顺,被明太祖升封为宣慰司,清代继续授予其宣慰司职(通常称为“明正土司”)。

从政治层面看,土司制度包括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中央王朝对土司“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其“易为统摄,奔走惟命”,通过土司达到对民族地区进行间接统治,维护版图统一;另一方面,土司通过中央王朝的册封任命,在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增强了其政治权威。同时,土司作为朝廷的官吏,又有忠顺朝廷,为国家“守土安民”、向政府缴纳赋税的职责。中央王朝还通过朝贡、承袭、奖惩等一系列规定,加强对土司的管理,密切朝廷与土司的隶属关系。此外,土司还要在国家有军事活动时听从征调,派夫役承担军需物资供应、率土兵参加战斗。尤其是明、清时期,土司隶属兵部,国家许多军事活动,都要征调土司兵参加。

由于土司“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在其领地内享有相对大的自治权力,俨然一小“国王”(藏语通称土司为“甲波”,即因此),容易形成夜郎自大,不服管理,甚至“悖逆作乱”的情况。故土司是否“恪恭”“忠顺”是决定土司制度是否成功的一大关键。为了使土司“恭顺”,历代王朝都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奉行“顺则抚之,叛则剿之”的政策。对于叛逆、不听命的土司要予以惩处,甚至不惜动用大军征剿,“务使其畏威慑服”,以树立朝廷的威信。乾隆不惜耗费国库的一半来平定两金川,即是显著的例子。反之,对于“恭顺”的土司,朝廷

① 《宋史·地理志五》载:黎州“领羁縻州54”、雅州“领羁縻州44”、茂州“领羁縻州10”、威州“领羁縻州2”等。

则不惜给予厚奖崇封,以使其“感恩怀德”,“奔走唯命”。在这方面,汶川瓦寺土司,便是个突出的例子。从明代至清代,瓦寺土司一直被朝廷视为最“恪恭尽职”的土司,守土卫国累受褒奖。

二

汶川居都江堰灌口之上,扼成都平原通川西北高原之咽喉,处汉藏羌民族交汇之地,历来是川西北门户、汉藏羌交通的要冲。故秦汉时已置治。但因这里是羌、藏民族的聚居地,村寨、部落分处山谷,行政管理困难的缘故,历代对此地的治理虽开拓与羁縻并重,而实重在羁縻。明代以前这里已有一些汉族迁入,但仅居于岷江东岸边少数地点,县境大部地方为“番夷”部落村寨,各部落散处山谷,互不相率,常有滋衅。到明代正统年间,建立土司制,册封瓦寺土司管领“土民”后,才事权归一,对汶川藏、羌民族地方进行了统一管理。

瓦寺土司清代的全称是“加渴瓦寺宣慰使司”。

“加渴”,是藏语“汉管地方”之意,原指西藏东北部的“三十九族”地区(今西藏丁青、巴青、索县一带)。雍正三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清廷将青、藏一带的“玉树七十九族”(即79个部落)中的四十族划归青海管理,另三十九族划给西藏,但不是交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而是由驻藏大臣直属管理,因而被称为“甲得(加渴)三十九族”。三十九族中有一称“琼布”的大部落,原信仰本教,以“琼鸟”为祖神。在瓦寺土司世系的记载中,说普贤菩萨化身琼布,降于琼布山上,产下白、黄、黑三卵,卵化生三子,后来分别成为瓦寺、丹东及巴底、绰斯甲的土司。其实,琼布为本教中的一尊鸟神,具有降魔伏怪之法力。崇信本教的嘉绒藏族人家,都在大门的门楣之上画琼布神像以避邪。瓦寺土司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琼布之后,虽属附会,但也可说明几个问题:

一是,瓦寺土司之族源,与三十九族的琼部有密切关系,应是从中派分出的一支,迁徙来至川西

北地区的。瓦寺土司一支何时从琼布迁至川西北,虽不见记载,但就现所知,至迟在元明之际,它应已住牧于穆坪董卜韩胡土司境(在今四川宝兴县境)了。穆坪土司在元明时期是四川西北部最大的土司,势力范围达到今雅安地区北部、阿坝州西北部和绵阳地区西南部,所属部落众多。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理县的九子、孟董、黑虎一带土酋叛乱,朝廷命穆坪土司派兵协助平叛,瓦寺土司的先祖雍中罗洛思奉命,带领本部土兵经卧龙至绵虬,配合官军分路征剿。乱定后,朝廷以雍中罗洛思出力有功,封其为宣慰司,颁给印信,命驻汶川涂禹山,“以控西沟、北路羌民”,并将附近四山三寨之民划归其管领。雍中罗洛思于是在涂禹山上建立官寨,陆续将家族和部属由穆坪迁至汶川,瓦寺土司由此而始。

二是瓦寺土司与丹东(后与革什咱合并)、巴底(在今丹巴县境)、绰斯甲(今道孚县东北境)等一样,都属嘉绒藏族,原信奉本教。嘉绒藏族中有“嘉绒十八土司”或“嘉绒十四土司”之说,十八土司系指瓦寺、绰斯甲、穆坪、革什咱、巴旺、巴底促浸(金川)、赞拉(小金)、沃日、党坝、松冈、卓克基、梭磨、杂谷等十四个操嘉绒语的土司,加上明正、鱼通(在康定境)、沈边、冷边(在泸定县境)四个土司。由于明正等四个土司区内并不操嘉绒语,故又只称“嘉绒十四土司”。学术界普遍认为嘉绒藏族之先与汉代的冉駹夷和隋唐的嘉良夷有渊源,他们在吐蕃东扩时,与吐蕃之军相融,后来形成嘉绒藏族。因此,瓦寺土司自西藏琼布迁入阿川西北之前,这一带地区早已有嘉绒先民居处。从琼布来的瓦寺等部是在与当地土著融合后,而成为嘉绒藏族的一部分的。所谓“十八土司”或“十四土司”之称,实际上是由于嘉绒地区各土司长期姻亲相结,血统融合,因而认同为一。至于其族源则不一定相同。

至于为何称为“瓦寺”,历来均认为因该土司所在“以瓦为寺”而名。如《古今图书集成》记:“瓦寺土司祖籍乌斯藏,居住董卜内地。居惟土房,

① 清《打箭炉厅志略》载:冷边长官司“其先为西番瓦部酋长”

此寺独盖以瓦，故名”。民国康兴璧在《松理茂懋靖汶鸟瞰》一书中则说：“明代有高僧至涂禹山传教，土人相赠以瓦为瓦寺，故名瓦寺”。前者意指土司之家庙“以瓦为寺”，与周围藏羌的平顶碉房相异而得名。后者是说土司定居于此之前，涂禹山原有一瓦寺。二说稍有差异，然都说“瓦寺”二字是“以瓦为寺”之义。但笔者认为，“瓦寺”二字可能是藏羌语的译音，因为在嘉绒十八土司中，明正土司与冷边土司的族谱中都称其先为“瓦部”^①，它们所管的大渡河谷有一要冲，地名“瓦斯”沟，明清以前就有居民数十户。而“瓦斯”与“瓦寺”同音，藏语意为“瓦部之地”。考“瓦部”藏语意为“狐部”，与现今色达、理塘等地的“瓦述”部落本为同一族。在历史上瓦述是很大一部族，传说其祖先受狐之庇护而生，故称狐部。原游牧于青海巴颜喀喇山以南，明代向东南部迁徙进入甘孜州与阿坝州境，后有一部分处山谷间改事农耕。穆坪童卜韩胡土司与明正土司接壤，互相联姻承袭，瓦寺土司既原在穆坪之境，可能与瓦部（瓦述部）有所联系或交融，或因此而以瓦寺（瓦述）为名欤？仅为一说存疑。

瓦寺土司在汶川最初所领之地仅绵虎涂禹山一带6寨，到万历年间（1573—161年）朝廷将草坡11寨划给其管辖，使瓦寺土司的势力达岷江西岸汶川的大片地方。清初，瓦寺土司是最早向清朝表示归顺的土司。当时的第十五世瓦寺土司曲翊伸，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向清军投诚，为清军防守灌口（都江堰），并积极协助清军进取成都，因而深受清廷赏识。顺治十五年（1658年）被封为“加渴瓦寺安抚使司”，辖境增加卧龙、三江、耿达等地。后来又因功累次被朝廷奖赏，辖境不断扩大。到清代中期极盛时，已奄有今汶川县大部地区和茂县、理县、都江堰的一部分地区，成为阿坝州境最大的土司。清代后期，调整土司领地，瓦寺土司领地只岷江西岸的28寨，约占汶川县三分之二地面。民国时期，随着四川省在阿坝地区的行政管理能力加强，土司权力被大为削弱，所原领28寨地方，被分别设置绵池、三江、卧龙、耿达、草坡5乡，行政隶于汶川县政府。土司仅存名义而已，虽无权力，但在民众中仍

颇有威信。土妇索赵士雅，曾被遴选为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

三

明清时代，阿坝地区的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土司动乱，唯瓦寺土司在500多年时间中，一直“忠顺”，不但在其领地内基本上保持了安定，而且参加过朝廷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在保卫国家，反击外国侵略中作出了贡献。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叛清，进兵攻取成都，瓦寺土司曲翊伸与其他土司一起奉调赴成都防堵吴军。各土司武装见吴军势大，纷纷叛投吴三桂。而瓦寺土司却率孤军突围，退保茶关，严守隘口，充分表现了对中央王朝的忠贞。乱定后，曲翊伸因“忠不从逆，守卫有方”被四川当局嘉奖，并奏请朝廷“敕下翰林院采入忠臣簿，以昭臣节，而励忠贞。”

瓦寺土司本身是藏族，所属土兵身体素质较好，能吃苦耐劳，能适应高原气候，故清代以来凡涉我国藏区的重要军事活动和重大战役，无不征调瓦寺土司参加。瓦寺土司和他率领的土兵在保卫边疆和维护藏族地区安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驻打箭炉的和硕特蒙古营官昌侧杰烈杀明正土司，进犯大渡河东。清廷令四川提督调瓦寺等土兵协同官兵进剿，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西炉之役”中，瓦寺土司出兵最多，建功颇大。康熙皇帝嘉奖道：“瓦寺土司此次征炉，奉派得人，屡奏奇功，朕心欣慰”。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军从川、青、滇三路进藏，驱逐盘踞西藏四年的准噶尔部。四川一路以噶尔弼为帅，松潘镇岳钟琪为前锋进剿，瓦寺土司桑郎温凯奉令率本部土兵随岳同征，沿途“招抚番众，甚为得力”。次年清廷以随征西藏有功，加封瓦寺土司为宣慰使司。

雍正二年（1724年），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罗布藏丹津叛乱，影响到青海、甘肃等藏区，年羹尧督军平叛，瓦寺土司派土舍阿宝等率土兵为前锋，转战卓子山、棋子山，因功被赐予“恪勤尽职”匾。

川边的瞻对(今新龙县),素以“地最险,人最强”闻名,其地土头有清一代经常骚扰川藏大道,影响川藏交通。雍正、乾隆时曾三次派四川提督率兵进剿,瓦寺土司每次都带兵数百名随征,不但很好的完成了艰巨的粮秣军需运输任务,还在攻取土酋碉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得到朝廷重赏。

大小金川之役,是清代在四川境内最大一次军事行动,“攻一寨如攻一城”,战争的艰巨和惨酷都难有其匹。瓦寺土司熟悉当地情形,又居进军孔道,成为清政府十分倚重的一支力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贡献突出,深受朝廷嘉许。乾隆四十五年瓦寺土司桑郎荣宗赴京朝贡时,乾隆破格赏给二品顶戴,并赐姓索诺木。(后瓦寺土司以索为姓,即因此。)在两次金川战役之间,乾隆十七年(1752)在阿坝地区还发生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杂谷土司苍旺叛乱事件,瓦寺土司率土兵随官军平叛,攻隘夺碉,奋勇争先,力破苍旺主寨。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侵略西藏,占据后藏聂拉木、定回、济咙等地。乾隆命清军入藏反击侵略者。经激战,大败廓军,清军乘胜前进直逼其都城廷布,廓尔喀惧而请降。在这次被乾隆列入“十大武功”的保卫祖国战斗中,瓦寺土司亦被征调派兵参战,瓦寺土舍^①都司王保率汶川三江乡土兵数百人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战役,在几次恶战中,不少瓦寺土兵英勇牺牲。今三江乡有“毛辫坟”,即是土兵牺牲后,将辫子割回安葬之坟。据说王保因功被朝廷赏给三品顶戴,拟任命为松潘镇参将。王不愿离乡,固辞,仍回瓦寺任土都司。

除上述较大战事外,有关四川民族地区的军事行动几乎无一不有瓦寺土司参加。瓦寺土兵因久经战阵,尤善登山越城,战斗力甚强,被人称为“瓦寺蜈蚣军”。

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经厦门进攻浙东,侵占宁波、镇海、定海。清政府为夺回被英国侵略军的领土,组织大军进击时,想到了英勇的瓦寺、

金川等土兵。专门令四川总督宝兴“于建昌、松潘两镇属内,挑选精兵…共足两千之数,委派曾经出师之镇将官带,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瓦寺土司索衍传派其弟土舍索文茂和三江土守备哈克里与大金川土千总阿木穰一起率土兵二千人,驰赴浙江前线,被编为前锋。索文茂与哈克里率兵随陕甘总兵朱贵自慈溪(今慈溪)大宝山进取镇海,哈克里率兵500进攻镇海招宝山上的威远城英军,凭藉瓦寺土兵“矫若猿猱”登山的本领,抢攻至威远城边,英军不敌,正拟散逃时,甬江中的英国军舰从背后向攻山土兵开炮,哈克里部腹背受敌,遭受重大伤亡。退守大宝山,继续抗击英军,终因弹尽粮绝,哈克里与部下数百人壮烈殉国。阿木穰在总兵段永福指挥下率土兵越城抢先攻入宁波城内,中敌埋伏,二百余人全部牺牲。进攻宁镇失败后,瓦寺土舍索文茂率领土兵,在朱贵的指挥下防守大宝山,利用地形,以杠炮(火铳)猛烈轰击敌人,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其间索文茂曾将英军引入湖沼之地,使其火炮失效,斩获英军百余人。但因指挥此役的奕经、文蔚庸庸,致使大宝山守军孤立无援,朱贵、索文茂等数百名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大宝山之战,使英军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英军曾感叹道:“自入中国以来,此创最深”。清廷后追封追赏索文茂等。

在宁海之役中,瓦寺等土司之兵大部牺牲,不仅让人看到英勇强悍并不能抵挡快枪洋炮的悲壮,而且也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捍卫祖国的一页。慈溪人民建“高节祠”以祀朱贵时,“绅士议谓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先于攻复郡城阵亡,忠义齐全,可以附祀”。足见土司率兵卫国赴难的行动,使民族畛域在此被“一国同胞”的认同所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司制对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观念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

民族的差异与区别从根本上说在于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到今天,除了识别认定的56个

① 土舍,指土司亲属担任头人者,因常带土兵参加军事行动,清代多封给土守备、土都司、土千总等武职。

民族外,还存在一些待识别的族群。众多的民族或族群,有着众多的独特文化,从而形成中华纷繁多彩的民族文化。但中华各民族又在中国长期大一统的历史格局下,保持着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在各民族、族群间产生一定的文化共性,从而又形成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一体多元,多元一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即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一事实。而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文化交流与国家认同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瓦寺土司史上,可以明显看到这点。

瓦寺土司所在的汶川,历来便是“汉番杂处”之地,汉文化很早就渗入这个地区,瓦寺土司虽为藏族,但辖境中有藏、羌、汉民族。这使他除藏文化外,必须了解汉、羌文化,以便管理其民。另一方面,土司因为经常要向朝廷和地方政府奏事、陈情、纳贡赋、从征调等,公文繁多,需懂汉文,因而土司不但一直聘用汉族师爷办理文续,还自身积极学习汉文,熟悉汉文化,并办家塾,令子弟入学,请师爷教以汉文化。这种请师爷处理公文和教私塾的情况不仅瓦寺土司有,在穆坪土司、明正土司等大土司也都如此。但瓦寺土司更特别的是早在清代前期就出资办学,让自己属民中佼佼者学习汉文化,培养人才。乾隆十二年,瓦寺土司与汶川知县等捐银在川西崇庆县购置水田63亩出佃,以每年所收租银,资助县学师生。土舍、总管等也纷纷效尤,延请汉族教师教子女。在有一定文化基础后,多将子女送到都江堰或成都深造。因而瓦寺土司辖区比其他土司地方文化程度普

遍为高。这也使土司辖境加速与内地文化的相融。据调查,民国时瓦寺土司地方,除喇嘛和尚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不识藏文,识汉文者反而大大多于识藏文者,土司对内对外的文书都用汉文。

在风俗习惯上瓦寺土司虽坚持嘉绒藏族的风俗与信仰,但也包容其他民族的风习与信仰,其辖地内既过汉族农历新年,也过嘉绒藏年和羌年,既有藏传佛教的“擦擦会”,也有汉传佛教的“盂兰会”、羌族的“羊年会”以及内地传入的“清明会”、“佛爷会”等。境内各族互相通婚也常见。第二十四代瓦寺土司就曾娶汉族女子为妻。在瓦寺土司之境往往出现喇嘛、道士、端公、释比等台作法祈雨、求吉的场面。这种不同信仰并行不悖,甚至互相补充的现象,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瓦寺土司辖境内文化的并存与交融。

清末的瓦寺土司索代兴及其弟索代赓,与四川内地交往密切,参加了川西的袍哥(哥老会),并把这种社会组织引进汶川。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四川发生保路运动,索氏兄弟作为哥老会首领与革命党人联络,聚集汶川、理县、灌县袍哥千人,组成同志军,举行推翻清王朝的起义,为四川的辛亥革命成功作出了贡献。解放后阿坝黑水等地土司曾叛乱,但瓦寺土司(时由土妇索赵士雅摄)始终拥护党和政府,积极拥护民主改革,仍然是土司中与时俱进的一个典型。瓦寺土司在时代大变革之际,能够不顾私利而顺应时代潮流前进,这应该与该土司长期接受汉文化教育和多次到内地交流,观念较新,易于接受新思想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 [1] 新唐书·地理志[M]. 中华书局点校本, 卷四十二, 志第三十二.
- [2] 清史稿[M]. 卷512, 列传299“土司”.
- [3] 西南民院民研所编. 嘉绒藏族调查材料[R]. 汶川县政协编. 瓦寺土司始末[M].
- [4] 瓦寺土司始末[R]. p6.
- [5] [6] 汶川县政协编. 瓦寺土司始末[R]. p6.
- [7] 清实录·宣宗实录[M]. 卷357.
- [8] 鸦片战争资料[M]. 第四册, 428.
- [9] 光绪. 慈溪县志[M]. “忠义”.

(责任编辑 张 斌)